



平安聚焦

家有喜事为何反而苦不堪言 人民法院推进移风易俗为婚嫁减负

□ 本报记者 张昊

“为了结婚，我给小兰(化名)一家23万元彩礼，这在我们农村种田、打工要多少年才能存到?”

“订婚宴逢人发红包，结婚要彩礼，‘三金’，攀比之风严重，结婚本是一件喜事，却让家庭背上沉重负担，甚至引发矛盾纠纷。”

近年来，涉彩礼纠纷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一些群众在遇到纠纷时表达出对高额彩礼的负面看法。

今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发布，为类案的审理、矛盾纠纷化解提供了规则指引。

司法实践中，法官如何运用好《规定》，平衡当事人双方利益?如何引导群众理性对待彩礼，助推提升高额彩礼专项治理效果，形成健康、节俭、文明的婚嫁新风?《法治日报》记者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采访。

彩礼名目繁多

“司法审判中的情况显示，彩礼是个统称，一些地方习俗中与彩礼有关的名目繁多，容易引发争议。”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张敬说。

在陕西省韩城市人民法院今年4月办结的一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就对“改口费”能否认定为彩礼一事产生了争议。

徐卓(化名)与张丽(化名)于2023年4月经人介绍相识，于2023年5月举行订婚仪式。订婚时，徐卓通过介绍人给付张丽彩礼5.88万元，并给付了“改口费”8800元。双方举行结婚仪式时，徐卓再次通过介绍人给付张丽彩礼8.8888元，同时徐卓又给张丽购买了“三金”。

两人举办婚礼仪式后不久，张丽经常借故外出，一走就是多天甚至一周不回家。此后，双方因感情不和而分居，张丽拒绝与徐卓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徐卓便将张丽及其父母告上法庭，要求三被告返还彩礼11.76万元。

张敬介绍说，“改口费”的给付是当地在缔结婚约时的一种习俗，在当地民间习俗中标志性显著。因此，法院认定“改口费”属于彩礼。

彩礼源于传统婚嫁习俗，记者采访了解到，各地习俗中不但彩礼数额不同，彩礼的给付时间点、名目也不相同。

在陕西省富平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案件中，原告孙飞(化名)诉请被告胡芸(化名)返还全部彩礼，其中包括订婚时给付的彩礼钱88888元，“衣服钱”2万元，“五金”(价值3.6万元)，“上车钱”1万元，“离娘钱”1万元。

诉讼中，胡芸认可的彩礼只有订婚时收的88888元，她认为其他花费都不属于彩礼。胡芸主张结婚时陪嫁了电视机、洗衣机、被子、被单等嫁妆，并且有终止妊娠经历，因此拒绝返还彩礼。

“承办法官根据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各项费用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的价值、给付人及接收人等因素，认定‘衣服钱’‘五金’‘离娘钱’‘上车钱’等属于彩礼范畴，彩礼总计164888元。”张敬说。

彩礼认定后，如何返还?记者注意到，《规定》完善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彩礼数额过高情形下的彩礼返还规则。人民法院可以



漫画/高岳

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这两起案件都以调解方式结案。”张敬说，法官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规定》开展调解，释法说理，缓和双方当事人及其家人的对立情绪，努力让双方当事人就彩礼返还数额、分期返还方案等达成一致。

治理高额彩礼

最高法发布的情况显示，涉彩礼纠纷案件中，大量超出家庭正常开支的彩礼成为很多家庭的沉重负担，在婚龄较短的情况下，这种不平衡尤为凸显。

2021年12月，张某某经人介绍与李某某相识。张某某婚前给付李某某彩礼19.99万元，次年9月，双方办理了结婚登记。不久后，双方因感情不和等问题向法院诉请离婚。张某某主张对方返还彩礼，“五金”(价值3.5万余元)及恋爱期间和婚后转账、开销等合计近30万元。

承办该案的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四级高级法官李程了解到，张某某幼年失去父母，目前收入不高。张某某转给李某某的款项中有20万元是向亲人所借。

“本案认定的彩礼金额为23.4万余元，这个数额已远超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倍，依据《规定》可以认定案涉彩礼数额过高。”李程说，司法审判中的情况也印证了高额彩礼并不是保障家庭幸福的秘籍。

该案中，结合双方办理结婚登记但两地分居，实际共同生活时间仅一个多月，尚未

形成稳定共同生活、未孕育等情形，法院酌情确定李某某返还张某某彩礼数额。法院还对双方争议的恋爱中，婚后转账是否应予返还问题作出裁判。

记者采访湖北、河南、江苏等多地法院了解到，司法审判中，法院均依《规定》综合考虑彩礼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给付方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当地习俗等因素，认定彩礼数额是否过高。

“从司法审判的角度，就是要通过案件审理，服务和保障高额彩礼问题的专项治理。”最高法民一庭庭长陈宜芳说，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4年提出治理高额彩礼问题。最高法通过发布《规定》及典型案例明确裁判规则，给予相关当事人以行为指引，推动提升高额彩礼专项治理效果。

推进婚俗改革

“2018年时，村里人均收入只有3万元，彩礼最多的却高达30多万元，而且越是贫困的家庭，彩礼钱越高。村里互相攀比彩礼的歪风盛行，让家有喜事的村民不仅笑不出来，甚至苦不堪言。”石炳启是河北省河间市兴村镇大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留意到高额彩礼给家庭、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石炳启向负责诉前调解工作的河间市人民法院法官道出希望制定村规民约改变陋习，河间法院立即指派经验丰富的法官到大庄村全程指导。

在法院指导下，结合附近乡村村民平均收入水平，大庄村将彩礼数额界定为5万元以下为“低彩礼”，2万元以下为“零彩礼”。大庄村将红白理事工作纳入“两委”班子管理，

村党支部书记担任红白理事会会长。基层党组织发力，将高额彩礼纳入基层治理范畴，大庄村的婚俗改革很快见到成效。

自2018年推行村规民约以来，大庄村成为河间市首批实现“低彩礼”的乡村，未出现因彩礼产生的纠纷。

高额彩礼，攀比之风与本地习俗紧密相连，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各地法院积极配合民政、妇联等部门的前端治理工作，移风易俗促推婚嫁陋习治理，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婚俗观，推动文明乡风建设。

河间法院则积极延伸司法服务，分布在全市乡村的20个法官工作站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将司法服务延伸到了老百姓身边。大量家事纠纷特别是彩礼矛盾得以就地解决。

福建龙岩法院结合办理彩礼返还纠纷有关问题，开展“救助治理”实证分析，以日常联络、巡回审判、随案随访等形式与各村建立密切联系，建议相关部门和乡镇因地制宜开展村规民约完善工作，提出相关修改建议14条，指导部分辖区45个村将“倡导聘金彩礼不超过5万元，随礼不超过300元”纳入村规民约中。此外，龙岩法院还紧紧围绕“联动”做文章，以“基层法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居干部、调解员”五大工作主体的联动，让解纷力量拧成一股绳，促进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

张敬告诉记者，《规定》实施以来，针对涉彩礼纠纷案件的特点，陕西多地法院、人民法院通过深入镇村(社区)开展巡回审判、法治宣讲，以案说法等，积极引导群众摒弃高额彩礼等陈规陋习，形成婚嫁“减负”、为家庭“减压”的良好氛围。

后，要求返还彩礼的情形;另一方面，部分地区出现彩礼数额持续走高，攀比成风，婚嫁关系存续时间偏短，甚至以彩礼之名行诈骗之实的情形。这些新情况的出现，不仅异化了婚姻本质，导致了利益严重失衡，也极大地损害了公序良俗，给社会治理带来许多隐患。”梁睿说。

在梁睿看来，审理涉彩礼纠纷时既要依法裁判，平衡双方利益，更要通过“小案”讲好“大道理”，引导人民群众更加理性地看待彩礼问题，推进移风易俗，倡导健康的婚嫁习俗。彩礼是以婚姻为目的的赠与，该目的包含结婚登记、共同生活、孕育子女等多项因素。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的，在双方离婚时一般不予返还彩礼，但若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原则上应当返还彩礼，但双方已共同生活的，应当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 本报记者 申东 □ 本报通讯员 郎中卿

“节假日期间，我们在镇北堡影城、110国道等重点区域和重要路段，投入无人机开展多频次高密度交通巡逻，有效解决警力不足等难点痛点问题。”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支队长隋宏陆介绍说，交通警察分局创新推出的无人机实战应用，在疏堵保畅、警情处置、交通宣传等方面发挥了出色作用，成为银川交警提高交通管理水平、更好服务人民群众的得力助手。

今年以来，银川市公安局聚焦奋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以深化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构建“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为牵引，以夯实基层基础为保障，全力打造“塞上枫桥”新警务，全面提升动态环境下社会治安控制力，以新质公安战斗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走好网上群众路线

“通过发掘社会潜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是解决警力不足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提升群众安全感、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必由之路。”灵武市公安局西郊派出所所长师学林说。

师学林表示，以往社区民警挨家挨户走访巡查工作量大，现在西郊派出所通过线下走访征集辖区治安积极分子1300余人，建立了微信工作群1362个，开拓了一条响应有速、处置有方的新路子，成为推动辖区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

“孩子上户口需要哪些手续和材料?”“听说你们现在有上门办证服务……”只要是群众的呼声，在社区微信工作群里都能得到回应。

目前，银川市600多个由社区民警牵头建立的民警微信工作群，覆盖村(社区)干部、平安楼栋长(村民小组组长)、网格员、物业管理人员以及居民住户和企业员工代表等18万名，社区民警第一时间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同时，银川公安还通过建立银川市公安局门户网站、“银企安”小程序等线上服务平台，开通“平安银川”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及短视频号等方式，让群众更加便捷地了解公安工作，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

创新警务运行模式

“3月18日早高峰期间，虽因长城路与正源街路口西北侧仍在施工，封闭了4条车道造成车辆通行缓慢，但经情指中心及时加派现场警力疏导，并实时调控信号灯，整体通行平稳有序。”银川市公安局交警分局情指中心主任张强说。

2023年，银川市交警分局抽调骨干民警进驻情指中心，科学设置专岗，着力打造一支“懂实战、能指挥、会研判”的情指队伍，通过构建“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将指挥调度工作特别是紧急警情的指挥调度作为警务机制改革创新的重点强力推进，强化分局、大队两级扁平化指挥调度，推动实现调警更顺畅、处警更精细、用警更科学。

银川市公安局以“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改革为牵引，树牢实战化、扁平化、合成化导向，紧紧围绕加强技术手段支撑，优化互动响应流程，突出全量综合赋能等重点任务目标，全面重塑“五大中心”运行体系，推动构建人员力量集中、手段技术集约、数据资源集成的“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加快形成和提升新质公安战斗力。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2023年10月25日，银川市公安局“银企安”服务平台启动，平台设置办事指南等8个模块，实现大货车通行证办理及互联网上营业场所新建、变更等61项业务一网通办，有效提升行政审批效率;25项公安行政检查事项权责依据、执法痕迹一网可查，提高了规范执法水平。

“他们挣的都是辛苦钱，我既要守护他们的安全，也要帮他们看好‘钱袋子’。”兴庆分局大新镇派出所辅警侯海彪在工地施工期间，定期在线上给辖区工人转发反诈宣传片，相关警情通报等，提醒大家增强防范意识;在线下，他手把手教工人们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为他们讲解反诈知识。两年来，侯海彪累计劝阻受骗群众近200人，挽损金额100余万元，牢牢守护了工友的“钱袋子”。

治理重心在基层，治理重点在服务。近年来，银川公安不断延伸服务触角，聚焦银川发展所需，企业所急，制定出台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十二项措施，探索建立经侦工作站、“警税检”前置工作站，搭建“云上”警务站15个，精准把脉重大工程、重点企业新诉求，针对实际问题提供定制化、精细化服务。

今年以来，银川公安先后推出“平安工地”等特色品牌服务，组织警力实地走访企业850余次，开展法治安全宣传900余场次，服务职工3万余人次，解决各类困难200余个。

葡萄架下普法化干戈 吐鲁番法院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赵春燕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两级法院秉持“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聚焦企业司法需求，持续打造司法服务“组合拳”，在营造暖企、惠企、安企的司法环境上取得实效。

“现在企业经营怎么样?有哪些方面的困难?”4月10日，由吐鲁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常映华、行政审判庭庭长付劲松等专业化组成的普法志愿服务队走进吐鲁番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员工诉求和企业建议。

普法志愿服务队成员介绍了吐鲁番市中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开展的工作及相关举措，并征求了企业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向企业负责人解读了有关企业劳动合同签订、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典型案例，现场发放宣传手册，针对企业如何规范经营、避免纠纷等提出了20条具体的意见建议。

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吐鲁番市中院审执适用涉企执行措施，充分利用执行和解制度、分期履行、以物抵债等方式缓解企业经营困难，为企业正常经营留有余地。去年以来，吐鲁番市两级法院采用活活活活方式执结案件95件，为109家被执行企业保留运转资金，最大化保障了企业正常运转。

2023年12月，吐鲁番市中院利用涉企诉讼“绿色通道”，不到一个月就成功调解一起标的额高达1.25亿元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减少了企业的诉讼成本，为企业正常运转提供了有力保障。

“涉企案件快立、快审、快执、快结，加速解决矛盾纠纷，有利于最大限度减轻企业诉累，维护其合法权益。”该案承办法官丁茜说。

为努力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吐鲁番市中院创新服务举措，推进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减少群众诉累，从坐堂问案变成上门坐诊。今年

银川公安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 六百个警民微信群都在聊什么

3月以来，该院多次将多功能巡回法庭车开到田间地头，来到农民家门口，进行了一场场别开生面的“家门口的庭审”。随着法庭落下，巡回庭审正式开始，整个庭审秩序有条不紊，旁听庭审的村民直观感受到了法庭庄重的气氛。

吐鲁番市两级法院通过巡回庭审现场以案说法，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了人民法院便民利民的诉讼服务，打通了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把法庭开到葡萄架下，哈密瓜地里，葡萄干市场边，实现就地办案、现场普法，助推乡村振兴。

今年春节期间，王某某一家4口前往吐鲁番市旅游，在高昌区某景区游玩时，不慎被一块脱落的瓷碗砸中头部，事后双方因赔偿问题发生分歧，请高昌区人民法院帮助解决纠纷。

接到电话后，高昌区法院旅游巡回法庭的法官立即前往景区，在了解案情后，法官从法理、情理角度对双方当事人释法明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协议，王某某的医疗检查费用由景区承担，同时景区向王某某支付一定的费用作为补偿。

至此，该起纠纷得到迅速化解，双方当事人均接受调解意见，并对法官的工作态度、办事效率给予了高度评价。

新规施行后如何认定彩礼及返还比例

法院衡平利益用“小案”讲“大道理”

□ 本报记者 张展

近年来，高额彩礼问题凸显，社会公众对彩礼纠纷亦比较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审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制定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自今年2月1日起施行。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首次适用《规定》中的条款审结了一起彩礼返还纠纷案件。

【案情回顾】

当事人贾某向北京一中院提出上诉，要求被上诉人李某返还其给付的所有财物。贾某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交了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购物小票、银行转账记录等凭证。经查，贾某与李某于2021年初通过婚恋网站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恋爱期间，贾某为李某购买了手机、首饰(首饰购买于5月20日)，多次转账合计4万元。

后双方开始不定期共同居住，谈论结婚事宜并定好了彩礼数额。贾某同意给50万元彩礼，之后，贾某向李某转账15万元，剩余彩礼未付。半年后，双方因性格及生活习惯问

题分手。审理过程中，贾某称其给李某买的手机、首饰以及转账均为彩礼，要求李某返还全部银行转账及手机、首饰折价款。

【法官说法】

“恋爱期间给付的财物，需要据实判断是否为应当返还的彩礼。”北京一中院团法庭庭长三级高级法官梁睿指出，根据《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时，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接收人等事实，认定彩礼范围。

据梁睿介绍，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一)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二)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三)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即认定彩礼需同时具备以下两个要件:一是没有其他给付义务，系一方因期待与对方缔结婚姻而实施的给付行为;二是需双方对于结婚的目的均明知。

“据此，贾某为李某购买的手机以及转账的4万元系恋爱关系中贾某为增进感情进行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不属于彩礼;贾某为李某购买的首饰系在特殊时间点购买，属于

表达或增进感情的消费性支出，亦不属于彩礼;贾某向李某转账的15万元发生在双方沟通彩礼数额之后，性质也经双方明确确认为彩礼，因此，可以认定这15万元为贾某为达到与李某某结婚的目的而给付的部分彩礼。”梁睿说。

梁睿分析认为，根据《规定》第六条，关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据此，法院判决李某向贾某返还彩礼15万元，驳回了贾某其他诉讼请求。

【法理分析】

“彩礼在我国有着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通常，彩礼给付发生在婚姻缔结前，在婚姻不成的情况下，彩礼应当予以返还;反之，已经结婚的，彩礼一般不再予以返还。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彩礼背后的社会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婚嫁关系成立以领取结婚证为准，但在部分地区，人民群众仍然以举行婚礼、共同生活为标准，导致出现大量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